

COMMENTARII  
CLASSICIT  
ET

#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

——纪念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

柯林伍德 斯宾格勒与历史循环论

梅里 斯宾格勒的不详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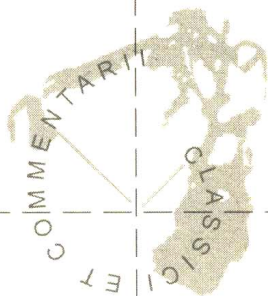
卡里瑟斯 孟德斯鸠的历史哲学

伊尔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结构

李獨清 劉向別錄考釋

華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50)



#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

——纪念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

■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编  
顾问 /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 娄林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纪念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娄林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8. 10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540-0

I. ①斯… II. ①娄…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4795 号

---

##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

---

主 编 娄 林  
责任编辑 马涛红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 目 录

## 论题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刘小枫 策划）

- 2 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大陆快照…………… 贝尔托诺
- 21 斯宾格勒的不详预言…………… 梅 里
- 40 斯宾格勒论民主、平等与“无历史性”…………… 贝尔托诺
- 54 斯宾格勒与历史循环论…………… 柯林伍德
- 73 斯宾格勒与古典时代的启示…………… 戈特弗里德
- 89 斯宾格勒世界历史哲学的转变…………… 法伦科夫

## 古典作品研究

- 12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结构…………… 伊尔廷

## 思想史发微

- 153 孟德斯鸠的历史哲学…………… 卡里瑟斯  
186 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观念的批判…………… 郑和烈

## 旧文新刊

- 224 讀《廣論語駢枝·微子篇》質章太炎先生…………… 黄云眉  
232 劉向別錄考釋…………… 李獨清

## 评 论

- 279 评《阿伦特的宪政主义》…………… 沙 孔  
286 评劳勒《现代的美国式尊严》…………… 施耐德

**论题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

## 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大陆快照

——凯泽林的《欧洲》与斯宾格勒的《决定时刻》

贝尔托诺(Thomas F. Bertonneau) 撰

张培均 译

1984年,刚开始研究生生涯不久,我注意到,将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在当时,人们可以在研究生人文课程中遇到这类家伙——往往痴迷于时事问题和当下之事。一些人明确追随这种或那种非历史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a-historical),非常强烈地认同所谓的先锋派(avant-garde)或“前沿”(cutting edge),而他们昨天还对这些弃如敝屣,视为一种需要谴责的东西,以便为改革生存方式让路。但是,多数人曾经是(我猜现在还是)墨守成规者,他们寻找某些提示,以便告诉他们可以摆出哪些有效的姿态或用哪些话表明自己赶上了“时髦”(with it)。赶上“时髦”在198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比较文学课程中意味着熟悉“理论”,而“理论”意味着法语刊物《当代哲学家》(*philosophe du jour*)的最新预言,好像几乎在作者写出之前就已通过那些学术责任的指向标——大学出版社——发行。首先是福柯,然后是德里达,再然后是利奥塔。由于明天迅即变成昨天,人们感到一种要跟上一系列望不到边的



“时髦”大师 (gurus) 的恐慌, 害怕自己在其他消息更灵通人士面前显得是滑稽的后备派 (derrière-garde)。

由于信念上的保守, 我决定走一条相反的道路: 忽视先锋派而往回读, 可以说是进入另一间档案室, 里面是那些被遗忘的、边缘的书——任何一个被既有体制认为可敬的人都不再去读它们, 我同时侧身进入当代的异端。这个古怪的计划变成了一种习惯, 但也有幸运的收获, 比如我与两本奇异的厚书的结识, 它们尽管奇怪, 但在我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年中, 它们在欧洲心灵的显著成就中独树一帜。一本是凯泽林伯爵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的《欧洲》(Europe, 1928年), 另一本是斯宾格勒的《决定时刻》(The Hour of Decision, 1934年)。在被上帝遗弃的当前时刻, 这两本书都以不小的批评敏锐对我们说话。

---

事实证明, 斯宾格勒是比凯泽林更加持久的人物, 但魏玛民国早年的读者更了解凯泽林而非斯宾格勒。人们谈论斯宾格勒, 但他们阅读凯泽林, 后者的风格更易接近。作为波罗的海容克 (Baltic Junker) 的后裔, 凯泽林伯爵 (1880-1946) 在大战的余波中时运不济。新获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 明显无力扭转往昔的布尔什维克政策, 没收了 (毋宁说是再次没收) 这位说德语的前贵族的固定财产, 他就此失去了赖库尔 (Rayküll) ——位于容克治下的利沃尼亚 (Livonia) ——的世袭凯泽林家产。凯泽林发现自己失去故国、一贫如洗, 在寻找职业时, 他剩下的唯一资产就是所受的教育 (在 多尔帕特、海德堡和维也纳受到的高等教育)。但与俾斯麦孙女的婚姻 (1919年) 还是让凯泽林多少有些地位, 而他的第一本书《哲人

旅记》(*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1922年,以下简称《日记》)的成功,则让他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日记》很快被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六种语言,迄今仍然可读,甚至还很迷人。1914年,在战争爆发前,凯泽林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日记》根据不同国家对当时世界作了一番描述,以沉思的方式记录了那次旅行的教训。

《日记》显示出一种世界公民-自由主义的(cosmopolitan-liberal)态度,兼具显著的神秘倾向。相比之下,他的另一本书,《欧洲》,德语原文作《欧洲的光谱》(*Das Spektrum Europas*),则将作为一次为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高质量)申辩而令读者震惊。凯泽林对不同欧洲民族作了“光谱分析”,既分析它们独特的个性,也分析它们复杂的相互关系,从而推进了这一论点:如果欧洲要从自己爱发牢骚的多样性(variety)中锻造出行政上的统一体,它要这么做才可以——将充分的权利和合法性赋予各种样态(varieties)。

凯泽林支持一个适度的泛欧洲政府,其首要职能是调解不同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争端,但与他往常的习惯一样,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凯泽林关于一个泛欧洲的行政机构的概念,因其适度而不同于很多早前人物的提法,比如威尔斯(H. G. Wells)的泛欧洲概念,构造了各种纯理论的乌托邦——例如在《诸神般的人们》(*Men Like Gods*)中,这些乌托邦都预言民族国家将会解体,不只是变成一个泛欧洲的组合体,而是变成一个世界共和国。当然,威尔斯假定英语,而非法语或北京话,将成为那个共和国唯一的统一语言。精英将教育民众,以使最初着迷(captive)的一代人彻底放弃任何民族认同之类的东西。在《欧洲》最后一章,在一次关于民族“类型”的讨论中,凯泽林坚持认为他自己对认同的感觉,不同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宣传的认同,后者的认同类型是“国际的”或与具体的政治有关。就具体的政治认同而言,主体使自己的个性屈身

融入意识形态的构建。凯泽林对此的反应就像对待一种毒素。凯泽林问道：“当我分析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时，我发现我自己会是什么呢？”凯泽林的回答是：

首先且最重要的，我是我自己；第二，一位贵族；第三，一个凯泽林[家族的人]；第四，一个西方人；第五，一个欧洲人；第六，一个波罗的海人(Balt)；第七，一个德国人；第八，一个俄国人；第九，一个法国人——是的，一个法国人，因为我以法国为师的那些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全然没有进入其中。阅读《欧洲》中那些自传性的段落，尤其是“波罗的海各国”一章中的那些段落，人们偶尔会获得这一印象：就凯泽林的自我评价而言，归属波罗的海地区，其实比它的位置在他明确的认同等级中所表明的更加重要。

《欧洲》施展了一种关于个人特性与民族特性的考虑周详的辩证法，凯泽林在“导论”中展示出这种辩证法的精微之处。在同一篇“导论”中，作者还阐明了他判定相互对立的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绝对合法性的理由。凯泽林以一句摘自保罗致罗马教会的名言弥合整本《欧洲》：“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sup>①</sup>他的辩证法产生自他的如下信念：基本人性和人类对政治存在的安排均不完美。

凯泽林借助一个人们广泛应用的例子注意到，拉丁臣民(Latin subject)的身份感是“civis Romanus[罗马公民]……这在作为个体的他的内部唤醒一种深刻的自律感和义务感”；凯泽林也宣称，

① [译注]《新约·罗马人书》3:23,中译采思高本圣经。

人若试图从他是某个特殊团体的成员这一事实推出自身价值,那是在歪想,除了展示出一个荒唐的景象,还会使自己令人生厌。

对凯泽林而言,这两种说法不含矛盾。本着圣保罗的精神,凯泽林确实危及了这一笼统的——对一些人而言是烦扰的——法则:“在任何单一民族中,民族元素本身都不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绑在一起”,因为,“每个民族的天赋被相应的缺陷所平衡”。如凯泽林所见,“民族精神的唯一价值在于,它可以对个人起到基本质料、形式原则的作用”。在反讽的结论中,凯泽林如此结束自己的三段论: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每个民族都本能地以自己已产生的有世界影响的(world-important)人物的数量和质量衡量自己的地位。

在凯泽林警句式的判断中,一方面,“个体之物和独特之物超越于民族之上,无论是某人自己的还是另一个人的”;另一方面,“价值与乌合之众(mass)二者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凯泽林对“乌合之众”的轻蔑,他指出,“基督宣扬对自己邻人的爱只是因为他头脑中没有博爱和民主”。

凯泽林援引希伯来神学和日耳曼音乐为例,进而声称:

一个民族只能在某些方面为人类实现意义;亦即,在这些方面,这个民族的特殊才能可以令它适合对全人类产生作用。

因此,对凯泽林而言,求助于“关于正义的抽象思考”是“无用的”训练,严重违背某种“宇宙真理”。考虑到凯泽林体系中个

体的中心地位,读者一点都不会惊讶作者在《欧洲》中坚持的看法:他认为个体不仅拥有权利,而且实际上生活在一种伦理规则之下,以便根据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等级就各个集体发表公共判断。

在绝对意义上,强壮和美高于虚弱和丑;在绝对意义上,上级高于下级,而贵族高于平民。

除了带来其他的乐趣,《欧洲》还使凯泽林赋予自己“完全的行动自由”,以一种“内在解放”的精神表达这类判断,有教养的读者肯定会欣赏这种精神,以同等的严肃和反讽对待每一个人。

凯泽林承认,“对于此书,有些人除了愤恨什么也没有”。他实际上希望“所有法利赛人(Pharisees),所有非利士人(Philistines),所有傻瓜,资产阶级,无幽默感的人,头脑迟钝的人,会被深刻地、彻底地伤到”。这些话几乎更适合——当然更适合、极其适合——公元(Anno Domine)2009年而非1928年;但人们会在上下文中预设这些话的合法性。凯泽林预先提醒他的读者,像在评估其他民族时那样,在评估“我自己的民族”——意为波罗的海人——时他会推行同样的标准。

## 二

可以说,在总结《欧洲》时,一个人只能抽取样品,牢记凯泽林的警告——他必定要得罪那些易于得罪的人。读者需要自己去探索《欧洲》,去发现凯泽林关于荷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瑞典人和瑞士人的说法。接下来的内容只谈及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有关的章节。第一章开始分析英格兰,章节顺序是否暗示了即便最温和的等级体系?凯泽林必须承认,他的英语读者对他的作

品是否流行至关重要。他对英格兰人的处理,尽管总体上讲不宽容,但确实由于钟爱而看上去亲热一些。对凯泽林而言,“对英格兰的狂热”(Anglomania)这一奇怪现象(现今人们会说“亲英格兰”[Anglophilia])间接地告诉了我们某些关于英格兰的东西。

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映像中看见自己,不是看见它本来的样子,而是它想要成为的样子;正如在世界大战中,每个国家都将自身无意识中最坏的特征归给它的敌人。

### 论英格兰

凯泽林以典型的直率陈述,将“本能”而非“智力”归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根据凯泽林的看法,

整个[英吉利]民族……对思考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偏见,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以任何方式执着于智力问题都怀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偏见。

作为本能的生物,英格兰人带着确信或至少带着确信的样子行事。在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中,正是这种确信,实用主义地转化为采取大胆行动的习惯,其他人对此相当钦佩,尽管对此有所误解。“英格兰人……是一种动物-人(animal-man)”;而且,“在梯级的最底端,他是马-人(horse-man),带有相应的马的特征。”对推理的厌恶可以解释不列颠帝国,它“简单地生长,对任何人的领域都没有意图”,受到殖民-官员型(colonial-administrator type)的管理,后者“几乎不思考任何东西,除了食物、饮料、运动以及——如果他年轻——调情”。

凯泽林眼中的英格兰人,不管宗派归属(sectarian dispensation)

为何,除了上帝,还崇拜“游戏规则”。因此,他“对一个人的土地、一个人的党派、一个人的阶级、一个人的偏见的忠诚……[是]第一法则”,所以“绝对价值的问题并不重要”。从这些倾向产生了“英格兰经验主义,它尽管极受法兰西人鄙视,却使英格兰人能够成功地预见时代精神促成的危机”。但是,根据凯泽林的判断,如果英格兰人在智力上没有天赋,他就会“在心理上更有天赋”,结果是,布里顿人(Briton)拥有“处理非凡人类质料(human material)的技能”。这种天赋的核心就在于凯泽林所谓的“原始”原则:一个人应当“己活活人”(live and let live)。英格兰人的个体感和权利感,在积极意义上,作为对现代潮流、对《贝奥武甫》(*Beowulf*)诸英雄和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的贵族-自我主义的一种反转,同样是原始的。英格兰保留了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多的中世纪习俗,这些风俗实为有益的镇痛剂,可以缓解现代性固有的去文化(deculturation)倾向。但凯泽林担心,英格兰人可能难以维持这个习俗,且会比其他民族更彻底地扎入“乌合之众时代”,正如其旁系美利坚民族——按他的判断——之所为。

### 论法兰西

放声大笑的高卢读者,只需翻转书页,就能收到凯泽林以独有的直率(patented forthrightness)给他们开的刺痛药量。讨论以足够的奉承开始。英格兰人根据本能生活,反之,法兰西人一般说来表现得好像是一种“普遍易懂的生命形式”(universally intelligible life-form);在法国人身上,人们看到一种有“意识”和有“智力”的生物,其理性——在高卢成语中——“为自己”编造了“一种完美的语言”。因此,“所有西方的意识形态,不管它究竟能否由法语表达,都可以在那种语言体内找到自己最易懂的表达方式。”不过,

“无论法兰西人的头脑多么明晰,他的自我意识都是情绪的而非智性的”,既然如此,这种自我意识凭借情绪本身,就“容易激烈地激起”其“为自身的终极辩护”。从巴黎人的情绪性,从其他人对法兰西的尊敬,用带有智性上的精确(intellectual precision)的法语来说,产生了最无吸引力的高卢品质:“法兰西人……总是在自己的对手中看到文明的敌人。”1914年出现的正是这种倾向,但在法兰西共和国诞生之时,雅各宾党人的凶残就表明了这种倾向的存在。

然而,如凯泽林所见,法兰西不是动态的而是本质上保守的民族,正是这一点使它能够在新一轮又新一轮无尽的革命中存活下来。1918年之后法兰西的真实角色,不应该像法兰西人自己通过国际联盟扮演的那样,是通过一些合理的模式去“恢复”——即去改造——欧洲,而应该是保存革命前文化的遗迹。“法兰西是欧洲最卓越的文化民族。”

### 论日耳曼

凯泽林关于日耳曼的话题,始于引用其老朋友沙皇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伯爵(Count Benckendorff)的话: *Ne dites pas les allemands; il n'y a que des allemands* [不要谈论那些日耳曼人;只有整体的日耳曼人]。根据凯泽林的看法,“只有从其他人的视角看,某个日耳曼人才存在”;但并非全然如此,因为人们可以作出适当的概括。一个日耳曼人是一个“客体生物”,他的“生命-要素,从外部看,永远(once and for all)最典型地见于对客体的崇拜”。因此,一个日耳曼人天生就是一名专家,致力于他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作为有序存在原则的专业技能本身。凯泽林利用了一个老笑话:

如果有两扇门,第一扇上面写着通往天堂,第二扇上面写



着通往关于天堂的讲道，所有日耳曼人都会走向第二扇门。

日耳曼人对客体和实物的兴趣造就了日耳曼人丰富的技术——日耳曼人在精密工程和日常生活的机械系统化中占据首要地位。日耳曼人尽管朝向客体，却在精神上为“不真实”所苦。为何如此？

凯泽林注意到，

人的个人要素，随着人的意识变得集中于分离的、具体化的观念而相应地衰退；而对那些不得不与他打交道的人而言，知道他们可以期待什么、可以依靠什么，事实上已变得不可能。

凯泽林没有预见到魏玛民国的瓦解和独裁的灾难，但在刚刚引用的那句话中，他确实看到了两者的原因。

《欧洲》的最后一章试图以预言作结。凯泽林写道：

欧洲正在作为一个统一体出现，因为，面对日益迫近的非欧洲的人性(humanity)，欧洲人共有的东西变得比那些将他们分开的东西更加重要，因此，新的因素开始在共同意识中统治旧的因素。

但是，凯泽林根据自己的辩证法，发出一个警告：欧洲各国面对非欧洲人而联合起来时，必须避免产生“疯狂的泛欧洲人”这一结果，这种人忘了各组成国的特殊性，“没有比以前更好地相互理解，反倒不再那么能够理解彼此”。倘若如此，那么，欧洲实际上会“美国化”。凯泽林以一个不祥的音符作结：

不止一种文化在达到全盛之前灭绝。亚特兰蒂斯、冈瓦